

第3章 好事多磨

在大同开展绿化合作项目不久，我写了一篇短文，由我的朋友李建华翻译后，登在了大同的报纸上。文章题为《小老树》，内容大致如下：

从大同县到怀仁县，道路两旁有很大面积的树林。矮的有一人高，树根处长有好多蘖^①，呈灌木状。最高的也就3~4米，长得无精打采地七扭八歪。刚开始看到这些树林时，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对日本人来说，对有树木的风景已经司空见惯，反而像黄土高原没有树的风景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以为这些树是自然生长的。

可是，实际并非如此。这些树是50年代初期人们一棵一棵地种出来的小叶杨。从中可以领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人们怀着建设祖国的热情，在绿化方面也做出了努力。

遗憾的是，这些树木没能茁壮成长。因为苦于缺水，结果长成了这副模样儿。当地的人把它称作“小老树”。虽然中国人在称呼“小”或“老”时往往表示亲切，但看着这些树，我们却感觉不到这层意思。这些树辜负了种树人的期望是确实确实的。

我安静地走进树林，不久对脚下松软有弹性的感觉惊讶了。拿来铁锹挖了挖树根周围的土。一直到很深的土层都是肥沃的黑土。这样的黑土在黄土高原很少看到。

40年间在这里生长，成为树林实在不易。这些树虽然自己没有长大，可是她每年用自己的落叶和枯枝肥沃了土地。当然，在这里也形成了微生物的小世界。

看到这些小老树，我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我们的绿化合作事业

^① 蘖：泛指植物由茎的基部长出的分枝。——译注



P67 图： 小老树。从 50 年代开始种植的小叶杨虽然由于缺水长不高，但是落叶肥沃了土地。

如果像改良品种的杨树那样茁壮生长，当然再好不过，但是即使长成像小老树那样，哪怕是肥沃一下土地，不也可以吗？在历史的长河中，把被破坏了的自然恢复起来，也许要反复经历这样的过程。

在我讲述和撰写小老树的过程中，大同的合作伙伴们开始说我是“小老树主义”。

我说：“我可不想死在这里。如果死了，就在那儿给我挖个坑埋了，然后捡块小石头，写上‘小老树化作一抔黄土’几个字就行了。”

“别说这种丧气话！”他们赶紧把话打住。

我最初是想围绕小老树写篇调查报告，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信仰

自白”。但是，我的那种想法在以后逐渐有了转变。

全国模范试点的悲剧

由于这里是北京的水源地和沙尘袭击北京的风口，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不久，桑干河流域掀起了大面积的绿化运动，以前只说是“大面积”，实际几乎包括整个桑干河流域县面积的 25%，各有 3 万到 6 万公顷。据说由于育苗跟不上，就剪小叶杨的树枝直接插到土里。尽管中国采取惯用的人海战术，这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树在开始阶段还长得不错。在 60 年代被誉为“南有湛江，北有雁北”，成为了全国的模范试点。所谓雁北，是指长城雁门关以北、大同周边地区。湛江是海南岛对岸广东省最南部的县（现在改为市）。

绿化是不划算的工作。不好的结果马上就显现出来，而得出让人放心的好结果，则需要等待好长时间。小老树就是典型的例子。

树小的时候用水量不大，因此成长顺利。等树长大了，胃口也大了，就把根伸到邻居那里，开始争水喝了。在这种状态下如遇到旱灾，树干的顶端就会枯死。但因为下面还活着，所以树枝就会变成新树干继续长。这种情况在周而复始的过程中，树木出现畸形，变得七扭八歪。体弱多病时，天牛会乘虚而入，弄得树木满身疮痍。

种植过小老树的人，最年轻的现在也五十多岁了。在小老树林里，经常为我们开车的司机马瑞告诉我们，他刚满十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参加过种树。“开始时树长得很好，我们别提多高兴了，比现在的树又高又壮。结果以后越来越萎缩了。”

“绿色地球网络”的顾问远田宏先生是日本东北大学的植物园长，每年在大同逗留 80 多天，一直继续着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他伐下几棵小老树，剖析了年轮。显示的结果和老马说的一致，最初十几年长得很好，但以后就停止了。可是直径略有增加，并没有萎缩，

只不过植树人感觉好像萎缩了而已。

如果对后世有用，即使成为小老树也未尝不可。我想得很简单，可是当事人会感到失望，心理受到创伤。既然要干，就必须成功。在日本，对国际合作活动做评价时，往往说是“非常艰苦的工作”，因此在业界之间基本形成了一个不言的共识：对成功的案例多少添油加醋，失败的案例则为无功有苦。

但是，大同当地的合作伙伴则会受到责难：“人家大老远地从日本赶来支援，你们怎么一个也搞不好呢！”

我开始对自己的天真想法进行反思了。

“我要上学！”

1993 年的秋天，我第二次访问了灵丘县。陪我同行的是共青团大同市委副书记刘怀光。他说：“因为希望工程的工作关系，我要去贫困地区的小学校视察。”我当然不愿错过这个大好机会。

前往的对象是上寨镇下寨北村。这是一座 100 户人家、不到 400 人的小村庄。这一带地处太行山脉腹地，水的条件虽然比较好，但是耕地很少。听说每人年均收入 230 元。

访问小学校时，不禁让我大为震惊。校舍破极了。也许是房椽子寿数已尽，房顶像波浪一样上下起伏。房瓦到处豁牙漏齿，纸糊的窗户已经褪色，千疮百孔。这里冬天很冷，气温接近零下 30 摄氏度。

走进教室，房顶上只吊着一只灯泡，光线昏暗。前面的墙壁上涂着黑墨，算是黑板。一年级到三年级，有 40 人左右的学生在一间教室里上课。只有一个老师。隔壁是“学前班”，有十几个儿童坐在小椅子上。

我从 1992 年开始往来这块土地，那年秋天在大同逗留了两个多月。浑源县林业局长温增玉领我坐着红色的森林消防车转过好多村

落。虽然走访了好多贫困村，但还没有见到如此贫穷的村落。

这时候我还很单纯，遇事怯场，怎么也不好意思把镜头对准教室里的孩子。最后掖着藏着，总算拍了两张学校的外景。我把穷看成是丢人的这种心态在这里体现了出来。其实我也没资格说大话。

我们走进村子。本来是上课时间，可是见到了小孩儿，其中也有背着妹妹、领着弟弟的女孩儿。

“你为什么不去上学？是不想上学吗？”我问。

孩子望着我，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了。



图：村里的小学校。气温达到零下 20 多摄氏度，可是纸糊的窗户破烂不堪。（灵丘县，1993 年 10 月）

“想去。”有的孩子只说了这一句，就一溜烟儿地跑走了。本来

不问也知道原因，我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每个村庄基本都有低年级的小学校，而接收高年级的小学校大多只有规模较大的村庄才有。低年级的教师一般由村里只有高中学历的人担任（这种情况比较多），但是高年级就比较难了，主要原因是师资得不到保证。

到其他村的学校上学也行，距离远的可以在校寄宿。如果这样，衣服必须要穿像样的，还要准备吃的，加上学费的负担，开销不小。

在日本，孩子过了 25 岁还依靠父母抚养的例子屡见不鲜，而这里到了 10 岁就成了劳动力。家人说：“上什么学，给我在家待着干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村，能上完小学六年级，已经很难了。

失学儿童中，女孩儿居多。从村里的土墙上写着“不要娶文盲”的宣传口号，这一事实也可以得到证实。这种现象剥夺了农村女性的自立机会，甚至成为了孩子多的原因。这也是恶性循环。

常常陪我喝酒的刘怀光，惟有那天晚上对我说：“对不起，今天我没心思喝酒。”

那天晚上，我也滴酒未沾。

为小学校建果树园

创建“绿色地球网络”的成员说来大多都是理想主义者，认为“虽然人类在 21 世纪面临最大课题是地球环境问题和南北问题，但是地球环境问题是变相的南北问题，因此这两个问题只能同时解决”。我也是认同这种说法的。

尽管如此，在面对在下寨北村目睹的远远超出想像的贫穷时，我吓得连照相机的镜头都不敢正对。我们成立组织的宗旨虽然是改善环境、恢复森林，但对贫穷所带来的问题难道不能有点作为吗？那天晚上，我躺在招待所的硬板床上翻来覆去，苦思冥想。

我想到了通过为小学校建设果树园得到收益来支援教育的主意，这样一来可以长期提供资金。第二天早晨，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刘怀光和县共青团的干部，马上得到他们的一致赞同，说：“我们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好主意呢？”绿化归绿化，教育归教育，这种条条领导模式不仅反映在行政机构的组织方面，而且也影响到了思维方式。我决心一定要实现这个计划。

这个时期，我们“绿色地球网络”正处于资金拮据状态。第一年勉强支撑过去了，但是第二年（1993年）集资未能如愿。有的人打退堂鼓了。由此我愈加意识到，做一项事业开始往往很容易，但维持下去可就困难了。

当我们向刚成立的环境事业团的地球环境基金申请赞助时，对方提出了疑问：“建果树园种杏树和保护环境有什么关系呢？”我整理了1992年和1993年在农村的体验和感受，答道：“该地区的问题在于环境的破坏和贫困有着恶性循环的关系，农村不能自立，环境也不会得到改善。”正是他们提出的这个疑问，给了我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机会。

那以后不久，地球环境基金部的加藤久和部长来到当地视察，不仅对我们的事业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还决定追加赞助资金。我们用这笔钱购置了汽车，保证了我们在当地活动的交通工具。在东京举行的研讨会结束后，我和加藤部长在一起时又提起了这个这话题。

“你们以前问我种杏树和环保有什么关系。”

“经过那次视察，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毕业了。”

真让人高兴。

在当地却发生了问题。“刘怀光副书记受到了批评，说为什么领外国人高见去看那么穷的村子。”这个小道消息也传到了我的耳朵。

另外，尽管市和县的共青团都积极地支援这个计划，可是遭到了村里长老们的反对。

“我们再怎么穷，再怎么苦，也犯不上要日本人的施舍。”

日本军队曾经给他们造成巨大的灾难。对于这些人来说，惟有对日本的仇恨和把日本赶走的骄傲，是他们有生之年的精神支柱。我的提案实在过于天真了。

1994年春天，我们绿色网络植树团抵达大同后，马上接到通知，希望我们去参加下寨北村小学校果树园的开工仪式。我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临时变更的日程让人感到高兴，但是害得大家在逗留的10天里没冲上一次淋浴，就直接回北京了。



图：建设第一个小学校果树园。全村男女老少都来种树，好像过节一样热闹。（灵丘县，1994年4月）

那次种树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全村男女老少都出来了。学生中井美和子加入锣鼓队，张着大嘴一边笑，一边敲鼓。做事一本正经的岛田光雄看到树坑里有石块，就下意识地伸手把它捡出来。还有富泽兄弟。刚刚认识的竹中隆尽管是初次来中国，但东奔西跑到处张罗。他们大多数在以后成为了绿色地球网络的骨干会员。

村里的孩子们无论是分树苗，还是给种好的树苗浇水，都干得非常认真。大点儿的孩子用桶和脸盆运水，连走路还不稳的小不点儿都拿着小水杯打水给树浇水。从北京赶来的翻译王黎杰一边用扁担挑水，一边不无得意地说：“这活儿我在干校干过。”

留着胡子的老人们坐在周围有说有笑地观看着。多好啊！后来知道，果树园开工是县里青年们努力的结果。听说为说服村里人，他们在此驻扎了两个多星期。

村里最后得出结论：“时代变了，作为和平与友好的象征，接受果树园。”并说：“很难有机会一次得到这么多钱，如果分给各家吃掉喝掉，这钱就糟蹋了。我们要把钱用在有利于将来的事情上。”村里把我们准备的劳务费统一管理起来，计划用它翻盖小学校舍。9月，贴着瓷砖的漂亮校舍盖好了。速度真快！孩子们再也不会挨冻了。另外，上寨南村的供水设备也做好了。

一份资金一旦在村里盘活，就会带来一系列的效应。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合作活动的原型诞生了。

建造防护林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和风沙，是以长期利益为目的的项目，等待结果出来最低需要 20 年的时间。而种植果树，对农民来说是中期利益的项目，如果顺利，四五年就会看到成果。至于小学校舍和供水设备的建设是短期利益项目。我开始认识到：把长期、中期、短期的项目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对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十分重要。

用购物袋装钱捆

“绿色地球网络”的事业在初期之所以得以迅速扩大，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汇率的变化。合作活动开始时期的 1992 年的汇率为 1 元人民币=26 日元。那以后，日元汇率开始迅速升高。

中国的通货单位是“元”，发音为“yuan”，用原来的繁体字是“圓”，但现在都用同音的“元”字来表示。日本原来也使用“圓”字，但现在使用“円”。在中国汉字里没有“円”字。如果将刚才 1 元=26 日元的汇率换成繁体字表示，就变成了“1 圓=26 圓”，让人不知所措。但是在日本，日元用“円”、人民币用“元”来表示是可以通行的。

还有更让人容易产生混乱的事情。那时中国的货币实行可和外汇兑换的“外汇兑换券”和通常的人民币（RMB）的双轨制。因为用人民币不能兑换外币，所以搞项目和想去外国旅行需要外汇的中国人便想方设法弄到外汇兑换券。用外汇兑换券还有可以在友谊商店和其他商店购买进口商品的好处。

因此，黑市也随之出现。在大城市，外汇黑市很是红火，看见外国人就尾追过来，压低嗓音说：“换钱，change money。”高的时候甚至可以换到正规价的一倍。也就是说，正规价 26 日元换 1 元人民币，而黑市价 13 日元就可以换到 1 元。

但是，黑市是违法的，而且伴有风险。听说有的钱捆只有上面一张是真钱，其他都用旧报纸假冒的。我的朋友在街头换钱时被公安抓住，钱也被没收了。虽然个人换点儿零用钱还无所谓，但拿公款却不能冒此风险。

由于外汇紧缺，国家出于想从国民手中筹集外汇的目的，实行了只对中国人的特别汇率，在银行的窗口而不是黑市用美元可以兑换人民币。但是，此法在大同却不通用。

我从日本带来的这些钱是人们善意捐赠的，所以还是想方设法更有效地利用它。在农村种树是不需要什么外汇兑换券的，所以我把美

元的旅行支票交给中国的朋友换成美元现金，再换成人民币，虽然麻烦，但到手的人民币基本多出一倍。换钱打的是“擦边球”，不算违法。

可是，用购物袋装满的百元面额钱捆怎么才能运到大同呢？这让我犯难了。我给日本大使馆打电话咨询，大使馆回答说：“通过银行汇款，手续费很贵，而且容易发生纠纷，自己带钱走又有风险，所以你就得权衡利弊，自己决定哪种方式吧。”

既然如此，那我就决定自己带钱走了。

我把此事一说，在北京经常关照我的一位女士就说：“那太危险了。特别是软卧，更危险。如果你主意已定，就把这家伙儿带上。”说着，拿出一把刀来。刀很漂亮，是她在少数民族地区买的。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可不愿意为钱把命都搭进去。”我拒绝了。

最后还是通过关系，让某大学的会计帮助从他们的账户划到大同的账户上去了。我施了小恩小惠，给了那个会计一点儿感谢费。第二年废止了外汇兑换券制度，一律变成了1元=13日元左右的汇率。经过两年汇率就高出了一倍。那以后日元汇率继续攀升，甚至到了1元=10日元，1美元=80日元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项目就好操作多了。

相反，遇上日元贬值时日子很不好过。本来计划的资金觉得已经筹集到位，可是一经换算，损耗了不少。一年中贬值到30%的时候，我们的日子真是难熬。

我们也尝试了从日本给大同的银行汇款。可是通过大同市青年联合会的银行账户，银行限制只能一天取1000元。这就派不上用场了。我又试着在中国的银行开设了自己的账户，让人把钱从日本汇过来。因为汇款需要银行的英文名称，我一问银行柜台，回答说：“不知道，你自己翻译好了。”好在银行的胶皮戳上有英文标记，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过了 10 天左右，我去了银行。营业员说：“钱倒是汇来了，可是日本的银行把密码弄错了，现在正在确认，几天内不能提现金。”

“那好，请你把事情经过给我写个证明，回国后要让日本银行赔我损失。”我给对方来了个下马威。

“不不，弄错密码的是中国的银行。”营业员改口了。结果，那天还是没能提出汇款。

过了几天，我又去了银行。这回说提现金要收手续费。本来在开设账户的时候告诉我不收手续费，现在取钱了，怎么又说要手续费了呢？

同行的青年联合会的常健民大喝一声：“不行！”常健民在体育大学学过武术，块儿很大，体重有 120 多公斤。银行方面马上转变态度，又改口说不要手续费了。

“怎么样，有我在，你没亏吧。”常健民很是得意。可是这种吃软怕硬说变就变的银行也叫人不放心。看来这条路也难行通。

以后那几年，我都采用旅行支票方式。因为听说用美元兑换合算，所以就采用美元。因为有时金额将近 1000 万日元，即使面额 100 美元的支票，也要在银行窗口签上几百张自己的名字，一签就是整整半天。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了，银行汇款开始让人放心了。现在有时候第二天汇款就能到。回过头来看，中国变化确实很大。我们初期遇到的种种困难，对现在的新人来说好像是天方夜谭。

搞试点

凡是走访过大同县徐疃乡的人，几乎都会感受到它的吸引力。第一个吸引力是地理位置重要。该乡地处朝北的斜坡地，有 12 个村庄。背后是东西走向的龙首山，南邻浑源县境。北侧是拦住桑干河的册田



图：12 公里之间有 48 条大小沟谷，最里边是相当于北京水源的册田水库。（大同县徐疇乡，1993 年 10 月）

水库。连接水库的东西长约 12 公里，龙首山和册田水库之间相距有 3~4 公里。

土壤受到侵蚀的情况很严重。每当下雨，龙首山下来的泥石流就要流进册田水库。听说册田水库建成后仅 3 年，贮水量就减到了计划的一半，因为被泥石流淤填了不少，其中包括来自上游的泥沙。据说桑干河的水 1 立方米含 44 公斤的泥沙，想起来也在情理之中。

登上后山远眺册田水库，被侵蚀的沟谷，好像两手十指交叉纵横重叠在一起。当地人把沟谷叫做“沟”。仅大的沟谷就有 48 条。

桑干河向东流，经河北省入官厅水库。从官厅水库开始，下游改称为永定河。永定河流向北京西南郊外，在那里有驰名中外的卢沟桥。这座被马可波罗誉为世界最美丽的桥，成为了日中战争的发源地。

永定河在天津附近与海河交汇流入渤海。所以说，桑干河是北京和天津的水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这个乡搞绿化的意义当然不言而喻。从日本来的绿化植树团对活动的意义也应该十分理解。

第二个有吸引力的因素是这个乡的干部。第一把手党委书记李子明是个豁达开朗、精明能干的男子汉。1989年和1991年，这里发生了地震（因横跨大同和阳高两县，故称“太阳地震”），土窑洞全部倒塌。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为了重建村庄，李子明被选派到了这里。

1992年和1993年的秋天，我在这个乡里逗留了半个多月，其他季节也走访过这里。如此集中走访村庄，在以后也没有过。在那期间，几乎每天和李子明在一起。当然有机会对他进行仔细观察。

我在担心，这个人实在太有能力了。像他这样的干部在农村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速度，农民能跟得上吗？我心中有一丝不安。他在家在大同市内，周一到周五他到这里单身赴任，住在乡政府里，因为不习惯火炕，把床架在火炕上睡觉。对这事我也是有些担心。

这种担心没过多久就云消雾散了。因为乡里的变化非常明显。最初的感觉是变得清洁了，变得明亮了。乡政府的厕所大都粪便起楼子（一想就直犯恶心），可是这个乡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道路也在逐步改观。

乡里人对李子明的表情也都变得亲切了。我和他走访各村，受到款待的机会也多起来了。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有人见到他，说：“明天我家杀狗，你一定得来呀。”我厚着脸皮跟着他真到了那家，对方忙说：“哟，你看我把日子给记差了。今天先吃这个，等明天再来。”给我们的是柴火上烤毛豆，我们一边吹气一边吃。

我考虑把这个乡做成试点。大同市青年联合会的干部也有此意。

我们决定从并不充裕的现有资金中拿出大部分资金集中投入该乡。这个乡很整洁，人口约有 5000。这也可以说是我考虑的第三个理由。虽然现在还很贫困，如果用活这笔钱，即使规模不大，也可以在短期内奏效。



图：在徐疇乡种植了 6 万棵杏树。绿化植树团在纪念碑前合影。这片果园在两年后全军覆没。（大同县，1994 年 4 月）

1994 年春天，我们在 1200 亩地上种了 6 万棵杏树。我们绿化植树团也参加了这项活动。打头的是李子明。他那在大庭广众之下有些害羞的笑脸，至今难忘。他挖好有些过大的树坑，填上堆肥，种上树苗，然后浇满水。在根茎部往上留出 1 米左右剪掉树苗顶端，然后在断面上涂上防腐剂。为防止干燥，再用塑料薄膜把根包上。如此细致

地种树，我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这种细致的作风自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破灭的梦

1994年是一个少见的好年头。从春天开始雨水就多，农作物长势喜人。在徐疃乡种植的杏树也长势良好，成活率接近90%。在一排排杏树之间还种了谷子、黍子、黄豆，杏树好像不服输似地冒出新枝。1995年春天，我们又扩大了杏树的种植面积，对枯死的树苗进行了补种。

1995年夏天访问该乡时，杏树的长势超过了我们的预想。大部分有一人多高。杏树地里到处竖立着纪念碑。党委书记李子明的笑声很有个性，他说：“有的杏树春天都开花了。尽管让杏树早结果会造成树苗发育不良，但我还是想让一些杏树明年就结果，这样会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好让他们有个盼头儿。”

他说这话有它的意义。这个乡的农民几乎没有栽培果树的经验。政府虽然号召种植杏树，但是能不能成功没有把握。同时，因为种植杏树，必然造成耕地的减少。如果让他们看到杏树真的结果了，农民们就会信心倍增。李子明的这种心情，我也深有同感。

1995年春天，我们在大同市南郊区平旺乡开始建设环境林中心。由于1996年春天开始了育苗工作，因此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环境林中心。1996年夏天，我时隔很久来到了徐疃乡。远田先生和摄影家桥本先生也与我同行，同时随行的还有翻译王萍、司机张德。

在去乡政府的路上，我就感觉出有些不对劲儿。我让车停下，走进杏树地里，一下子全懵了。用“全军覆没”形容也不为过。远田和桥本说：“这也太过分了，几乎都没活。必须得找出原因来。”桥本因为前年夏天第一次来大同时访问过徐疃乡，亲眼目睹杏树发育良好，

所以更感震惊。

听了徐瞳乡干部的介绍，不免更为震惊。头一次见面的新任党委书记说什么“杏树长势很好，准备在明年继续扩大种植面积。”看着远田和桥本瞪着我的目光，好像斥责“你都干了些什么！”让人感到钻心地疼痛。我以前尽量避免和中方发生冲突，可是这次，我实在忍不住了。

“杏树的成活率有多少，你们掌握吗？”我问。

“1995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因此出现了一些杏树枯死现象。即使如此，成活率也保证有70%。”党委书记答道。看到我们脸色不对，乡长又补充说：“即使达不到70%，起码也有60%。”这位乡长在去年担任县共青团委书记，是绿化合作活动的负责人。

我终于忍不住了，一脚把椅子踹翻。“跟你们说这些废话没用。我们走！”

脾气是发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此时此刻，我全然没有考虑。

可是，翻译王萍一边笑着一边翻译着我的气话。过后我对王萍也非常气恼。乡干部虽然见我气势汹汹，但听了王萍的翻译可能也就放心了。

“既然你们这么说，不妨咱们到现场去看看怎样？”

见到党委书记如此信誓旦旦，不禁使我更加震惊。如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成活率有百分之六七十，而我看走眼了，那可真该烧高香了。

我们选择了看上去长得最好的一块地来检查，把成活的和枯死的树苗一棵一棵地数出来。我一说“这棵不行”，“这棵也不行”，他们就说“这棵没问题，你看，叶子还绿着呢，说明还活着”。远田来到我们中间，说：“别看有叶，但因为没有形成明春的新芽，和枯死没什么两样儿。”听远田这么一说，他们也就不吭声了。结果，成活率不足10%。

我感觉自己的脚没有踩在地上，软绵绵的。乡干部强调的那些理

由，好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回响着。几年来的努力就这样地泡汤了。梦，我的梦，破灭了。也许是不应该有的梦。我强忍着，说：“把活着的树苗集中到一块地种上，其他的地就退给农民吧。”

6万棵的杏树转眼之间就全军覆没了，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是野兔。从冬天到开春之间，树苗的树皮被野兔啃了。特别是在开春之前，灾害更为严重。到了冬天，树木落叶，草地干枯，能保持绿色的树种仅有针叶树的松树和桧树。开春时节，动物干脆没什么可吃的东西了。

在日本，受害的树木基本上是直径1厘米左右的小树苗。好像被刀切似的，断得很干脆。再大一点儿的树基本上就能保住了。可是在大同，直径7~8厘米的树照样儿受害。树皮一旦被转圈啃掉，树苗就只有等死了。在徐疇乡，树木半数以上遭到野兔侵食。因为面积大、树苗多，马上难以找到有效措施。

我在1992年访问这个乡的时候，党委书记李子明就找我商量：“这个地方的野兔、野鼠很厉害，有没有什么办法对付。”我看到长成1米高的松树苗被野鼠连根啃掉枯死。

这个乡面临水库，还有放牧的羊，因此不好投用毒药，下套的方法又不切实际。在日本也探讨了对策，可是也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无可奈何，只好回答他：“没办法，只好把野兔的那份儿种出来，把野鼠的那份儿也种出来吧。”

这是没有认识到灾情严重性的不负责任的说辞。

到了夏天，这里发生了蚜虫害。由于暖冬和持续干旱，虫害很严重。到底是大陆的蚜虫，比日本的个儿大许多。一沾上这家伙，就会影响嫩苗形成冬芽。

乡干部说：“撒了农药也不见效。”我半信半疑，但也许是真的。有人亲身体会撒后无效的农药，我也曾看到报纸报道“农妇欲喝农药自杀，结果平安无事”。因为农药是假的。

尽管如此，把一切都归罪于野兔和蚜虫未免对它们有些冤枉。最重要的还是人。对工作那么热中投入的李子明在 1995 年被调到了其他乡工作，新书记走马上任。如果李子明还在这里，他会想方设法采取防护措施（前年就是这样）。可是，新书记没有采取什么对策。如果树苗生长无恙，新书记也可能会积极地采取对策，结果见到树苗经过一冬有一半被野兔啃掉，所以泄气了，加之此时又发生了蚜虫灾害。



图：李子明说，已经长成 1 米多的松树苗根被野鼠侵食后干枯了。（大同县，1993 年 10 月）

假树苗掺杂进来使问题愈发复杂化。在苗圃，是先播种培育砧木^①，

^① 砧木：嫁接植物时把接穗接在另一个植物体上的植物体。——译注

然后把优良品种嫁接上去培育成果树苗。根系在遗传基因上可以多种多样，而地上部分是克隆出来的。可是，嫁接树木的成活率顶多70%到80%。有人在失败后，偷偷把砧木上长出来的芽卖掉。农民称之为假苗。在长出叶之前，没有经验的农民是很难分辨真假的。我连有假苗这回事都不知道。假苗即使以后长大，果实也很小，而且又苦又涩，毫无价值。农民舍弃它实属无奈。

对农家来说，栽培果树，首先意味着减少了粮食生产。具有出类拔萃领导能力的李子明虽然接过了项目，但是后任却没有继承的能力。其他村子有的农民甚至拔掉了好不容易培育出来的杏树。

责任在于推进这个项目的我和合作伙伴。当时的祁学峰所长因为也是长在城市里，对农村的情况不甚了解。人的因素很关键，乡里的主要干部任期两三年就要换岗。而培育树木却需要很长的时间。这种状态持续下去，时间跨度长的绿化事业怎么能搞成功呢？

“官僚主义和绿化就好像往树上嫁接竹子，格格不入。”

听我这么一说，便有人反唇相讥：“频繁的人事调动是从日本的公务员制度学来的。”真是那么回事儿吗？

1999年秋天，祁学峰应经团联“日中植树造林合作研讨会”的邀请来到日本，会议结束后到我家小住一晚。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李子明即使留在徐疃乡不动窝儿，你就能保证项目一定会成功吗？”看得出来，祁学峰也一直惦记着此事。

“我想一定会成功的。”我回答。因为南邻的浑源县吴城乡的杏树项目非常成功，徐疃乡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的因素，都比他们更好。

正视失败

从初期的各种失败中，我们学到了很多。比如说，超过当地农民管理能力的项目肯定要失败。开始时从小规模起步，这样好有余力集中管理，待农民积累了经验有了自信心以后，再循序渐进。

但是，当地的干部可不这样认为，他们大都认为规模越大越好，资金越多越好。他们只想大干一场，动员农民齐上阵平整土地和种树。实际上最难的课题反而是种树以后的管理。规模搞得过大，一旦出现问题时就容易陷入被动，管理瘫痪。

从中央来的干部也是同样的思维方式。参观完我们的项目后，就说：干吗把地弄得那么分散，应该把它们集中在整块地上，这样既容易管理，成果也显得突出。当然也不无道理，所以他们要是那样去做，我也不会横加反对。

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经验。这个地方并不具备可行的自然条件。旱灾几乎每年都要发生，然而又不是单一的旱灾，就像马背，一侧是干旱成灾，另一侧是暴雨成患。土质条件复杂，就像花猫身上的花斑，加之人的因素也很复杂。

把每个项目做小，数量做多，也是考虑为了分散风险。在艰苦创业时，如果只死守着一两个项目，绿化事业肯定早就崩溃了。

同时，我们一个一个着手的项目也包含着实验的意义。几个项目上马，其中有成功的，也会有失败的。经过比较，会从中掌握很多学问。

另外，种植果树尽量避免使用耕地，而应利用废弃的耕地、荒山野岭、沟壑谷底等不用的土地。农民对侵害自己利益的事情非常敏感，即使将来有可能带来利益，但是对侵害眼前利益的事情也非常抵触。如果利用荒山种树，即使失败也不吃亏，一旦成功还捡了便宜，所以农民的积极性很高。这种经验也是从各种失败教训中学来的。

话题再回到徐疇乡上来。1999年，日本广播协会（NHK）卫视2频道在我们的配合下，作为系列节目《神秘的地球》之一开始制作《黄

土高原——寻找失去的森林文化》。节目编导柴田昌平说也想采访失败的教训。我不假思索地同意了，心想，那只有采访徐疇乡了。打上次以后，我一直没再去过徐疇乡。

汽车越走近徐疇乡，我的心情也越不平静。到了乡政府，我非常后悔不该领他们到这里来。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啊，连车也不好下。走在村子里，碰见的都是熟人，面对他们，说什么好呢？

上次和乡干部分手的时候，他们说：“非常希望继续绿化合作项目。失败的部分我们一定用自己的资金把它补回来。”我对他们话已经不再相信了，早有此意，当初也不会把事情搞糟到如此地步。

要使病入膏肓的项目起死回生，谈何容易！其难度远远超过顺利项目的维持，要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艰辛。要想恢复农民的积极性，也要花费很长时间。我判断，如果照此继续下去，创伤只能越来越大。

但是，这只是和乡干部之间的事，与一般农民没有关系。当时我没做任何解释就走了。今天我到这里来，也不准备做任何解释。

我在现场的地头，对着镜头，述说着失败的经验。看到残留在地里没做田间管理而苦苦挣扎的杏树，不禁一阵悲伤。说着说着，悔恨交加，悲凉之情涌上心头，我失声大哭。摄影师一之濑正史把镜头无情地对准我的脸，紧追不舍。

有的人操作植树项目说是“为了日中友好”，当然无可非议。但即使有好的动机，如果结果不好，又怎么对得起和你朝夕和睦相处过来的村民呢？

日本在世界上也是特别多雨的国家。无论是温度还是其它条件，都是得天独厚。然而，大同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所以，必须要抛弃日本人那种“树只要种上就能活”的常有观念。

尽管回忆徐疇乡的失败对我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经历了那次失败以后，成熟了许多，开始正视困难，从根本上考虑如何

运作了。如果在那里一帆风顺的话，也许会把徐疇乡作为样板，现在还在做着同一件事情。我在后面将谈到，植树项目在条件更加恶劣的浑源县吴城乡取得了圆满成功，但并不意味着就不会出现挫折。

通过徐疇乡的失败教训，我们多少变得聪明了。那以后的成果都是在那次失败以后产生的。这么一想，我觉得正视失败是非常重要的。